

类神经网络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干预

李小平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人与互联网构成的整体具备神经网络的诸多特性:(1)网络整体具备分布式特性与可训练、可学习及可调整性;(2)信息的产生具备非中心性;(3)信息的加工与传递具备平行性、迅即性;(4)信息的存储具备非中心性、高容损性。从类神经网络的特性出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演化机制及干预措施进行探讨。在机制层面具体包括:信息发布的非中心性和加工的平行性会助推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存储的高持久性会放大已发生事件与旧有信息的影响;误差调整机制将扩大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规模。在建议层面则提出应主要干预类神经网络而非网络群体性事件,并应树立调理的而非应对的思想。

关键词:类神经网络;分布式网络;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整体干预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3-0090-07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公民通过网络这一新型的传播工具基于利益表达和诉求的一种集体行动^[1]。目前有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已经蔚然可观。研究者从社会背景与结构因素^[2]、心理因素^{[3]89-91}、网络技术因素^[4-5]等诸多不同的层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和演化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这些探讨中,网络技术因素的影响作为一种新兴科技对人类带来的挑战非常值得探究。因为只要网络技术本身不消亡,它的影响便将客观而长期地存在。当前对这一因素影响的探讨已不少。具体包括技术管理因素的影响(例如网络环境的匿名性^[6]、信息发布的弱审查性^[7-8])和技术本身特征的影响(例如信息的推送性^[9]、快速性、广泛性^[10]以及类病毒传播性^[11]等)两个方面。但是相关探讨仍存在诸多局限。首先,当前探讨体现的是一种人与技术因素分离的思想。将技术作为影响因素,人作为被影响对象展开探讨。然而实际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化过程中二者很难分离,某个个体受到的技术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其他人通过网络给出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在技术上的作用具有一些特征,例如人数众多,影响迅即等。其次,由于缺乏

能将各种网络技术的影响囊括在内的理论框架,相关的探讨仍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例如,信息传播的迅即性和网络中“人人有个麦克风”^[8]、“把关人的缺失”^[12]等特征便被割裂开来进行分析。但是它们都作为网络技术特征,应该具有内在联系。最后,上述研究局限也带来干预策略探讨的疏失。目前从这一视角出发所提出的干预策略缺乏相互的配合。

一、人与互联网构成的整体具有类神经网络特性

仔细分析可发现,人与互联网构成的一个整体与神经网络类似,属于一种类神经网络。

第一,在神经网络中,其最小的构成单位是神经元。神经元只具备相当简单的信息存储和加工功能;其在状态上存在放电和静息(等待放电)两种;神经元放电时对其他神经元的影响则存在兴奋和抑制两种影响^{[13]27-54}。在人与互联网构成的这样一个整体中,人构成了信息加工的最小单元,同时尽管人有一定的信息加工能力,但是相对整个网络而言也只能算是相当简单的加工能力;人在网络中的状态也存在参与和静观两种状态。而

收稿日期:2019-11-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中的推断偏向因素及其干预策略研究”(13YJC840021)

作者简介:李小平(1980—),男,江西鹰潭人,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参与者中,他对别人的行为也存在促进与抑制两种可能的影响。

第二,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由神经突触相互连接起来。一个神经元可以对众多神经元产生影响,也同时受着众多神经元的影响,从而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分布式网络^{[13]27-54}。在人与互联网构成的这样一个整体中,人与人之间则由万维的互联网联系起来,互联网连接下的每个人同样既影响众多的他人,也受众多他人的影响,因而也构成一种分布式网络。

第三,神经网络作为一种分布式网络,一般而言,在信息加工时不依赖类似电脑 CPU 这样的中央执行系统,而是平等地依赖所有神经元共同表达的某种状态;不同的信息存储时不是如电脑般存放在不同空间中,而是存储在同一神经网络的不同状态中;信息的传递也不存在一个信息发送的中心,任何神经元都可以发送冲动,同时信息的传递也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路径,而是平行地向所有的神经元发送信息^{[13]27-54}。对人与互联网构成的这样一个整体而言,在形成一个共同的判断与评价趋势时,基本上也不依赖一个唯一且共同的核心判断与评价者,而是由所有参与者的判断与评价所反映出的共同趋势来体现;其作为一个整体所展现出来的记忆能力,也不是由某个人的记忆来体现,而是由人与互联网构成的网络整体的记忆状态来反映。发布相关观点、言论与评价时,基本上也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发布,不存在由某个核心成员唯一发布的情形;相关言论、观点的传递也不存在一个固定的路径,而是平行地被推送给所有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神经网络以及类神经网络中,由于同一信息可以储存在多个子网络中,而同一个子网络中的信息存储又不是一个节点存储一个信息的方式,而是整个网络的不同状态存储不同信息的方式,因此当某个节点损失时,由于相同的信息被保持在众多网络中,它并不会导致整个网络信息的丢失,充其量也只是某个属性的丢失^{[14]179-181}。神经网络及类神经网络的这一特性使得信息的存储具有高容损特性。与高容损相关联的特性则是信息存储的高持久性。在非分布式网络存储条件下,信息之所以提取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不再被提取出来或者没有线索指

向该被提取信息。然而,在分布式网络存储的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动能,信息只要在某一个神经元中得以恢复,其实就相当于在整个网络中得以恢复。这便使得信息在分布式网络中被遗忘相当困难。

第四,在神经网络中存在一些诸如祖母细胞这类特殊的超级神经元,其一个神经元便相当于一个子神经网络的能力,以子神经网络的地位与其它神经网络发生联系,但是这类特殊的超级神经元的存在不改变神经网络的整体特性。在人与互联网构成的整体中,也存在类似大 V 或门户网站这样的特殊单元,它们一个人或一个单位便相当于一个亚人群构成的网络,但是它们的存在并不影响人与互联网构成的整体所具备的特性。

第五,在复杂的神经网络中,神经元间、网络间的关系不仅仅存在简单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单向关系,还存在着反馈影响效果的逆向回路联系^{[14]179-181}。在人与互联网构成的整体中,信息的传播也并非单向的,同样会存在反馈回路。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神经网络及类神经网络中存在回馈环路,因此网络并不是一种被动式的网络,它将因此而具备了可训练、可学习以及可根据目标做出调整的特性。同时,这种学习和调整只能发生在训练中,而不能通过注入或说服的方式影响学习与训练的结果,并令其做出调整,原因是网络必须经历一次加工才能接受到一次反馈,并从中学习和做出调整。

总而言之,人与互联网构成的一个整体与神经网络类似,属于一种类神经网络。它的基本特性概括起来包括:

- (1) 信息产生的非中心化、加工的平行化与传递的迅即化
- (2) 信息存储的去中心化与高容损性和高持久性
- (3) 网络整体的协同性以及可训练、可学习和可调整性

文行至此,为了后文表述方便,将人与互联网构成的一个整体特指为类神经网络。因此后文中涉及类神经网络时,不加说明均特指人与互联网构成的一个整体,而不包括其它的类神经网络。

二、类神经网络特性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进一步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类神经网络的上述诸多特性都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有助推作用。

(一)信息发布的非中心性和加工的平行性会助推网络群体性事件

在这一方面,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以往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分布式网络信息发布的非中心性对网络舆情监管的影响^[12]。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信息的平行加工与推送性会导致信息被迅即传递,从而加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10]。然而信息发布的非中心性和加工的平行性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助推作用并不止于此。信息发布的非中心性也可以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因为非中心性的网络中,任何一个信息接受者同时又可以作为信息的传递者,从而导致信息的传递实际上是核反应链式的立体传递,而不仅仅是点对面的传递。同时信息的平行加工也将加大监管的难度,因为监管往往都是滞后的。在平行加工的条件下,由于是众人协作的方式完成信息加工,要完成特定的加工(例如人肉搜索)效率将非常高,信息传递的速度如以往研究者所指出的也将非常快,因而监管者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反应,从而导致监管困难。总而言之,信息发布的非中心性和加工的平行性将助推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也进一步解释了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何往往在极短时间内爆发。

(二)信息存储的高持久性会放大已发生事件与旧有信息的影响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与演化方面,由于参与者往往是低水平的,不会为之投入太多精力,所以容易采用一些不完善但经济化的信息加工方式——启发式偏向的方式——完成事件中的相关判断。而在诸多启发式偏向中,再认启发、证真偏向等都被认为是高频使用的启发式偏向。再认启发首先要求人们判断当前信息能否再认为过往已出现的信息,如果能作出这一判断,那么便直接依据加工过往信息时的认知、情感、态度对当前信息进行反应,并不再继续加工当前信息的细节^[15]。证真偏向则使得人们倾向于加工支持自己观点或判断的那一方面信息,而对否定自己观点或判断

的那一方面信息则倾向于忽视^{[16]630-633}。显然,由于参与者寻求经济化的信息及加工方式以及再认启发、证真偏向这些经济化信息加工方式的存在并被高频运用,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便要受到过往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后,“我爸是市长”^[17]、“我妈是站长”^[18]等一系列事件频发便可以认为是参与者将“我爸是市长”“我妈是站长”再认为“我爸是李刚”的结果;“山东疫苗事件”的爆发过程受到以往问题疫苗信息的影响则可以认为是证真偏向导致人们只关注假信息支持疫苗存在问题的一面而忽视假信息为过往信息的一面所致^[19]。

稍加分析可知,当已爆发的事件信息在存储上具备高持久性时,过往事件的类型便会相当丰富,而且会越来越丰富,关键信息也会非常详细,搜索这些信息亦会非常迅捷,从而导致新发生的事件往往都可以找到在某方面与之相似的已爆发事件,进而因运用再认启发的原因迅速演化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同时丰富且获取迅捷的过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也为有心者提供了丰富的加推素材,从而使得新爆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在证真偏向的作用下受到一些似是而非旧有信息影响的概率也会大增,进而增加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或助推其爆发规模。

(三)类神经网络的可训练、可学习及可调整性也将助推网络群体性事件

类神经网络的这些特性意味着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过程中,类神经网络会无时无刻地依据反馈(是否达成目标的反馈)而发生着调整。在这种调整机制的作用下,当类神经网络认为其预期目标未达到时,例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者被认为存在拖延、掩盖真相、转移焦点等消极行为时,将不断地发送冲动,直至目标实现为止。甚至当多次冲动发送后仍发现未达到目标时,会驯化更多的神经元参与后面的冲动发送,从而导致冲动的发送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最终助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水平和规模。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应对方不诚实应对问题,逃避、掩盖、拖延、寻找临时工为替罪羊等一系列问题都将反过来助推甚至极大地助推网络群体性事件。

三、类神经网络特性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干预的启示

(一)类神经网络非中心性的认识应全面而深刻

在类神经网络的非中心性方面,尽管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网络中“人人有个麦克风”^[7]、“把关员缺失”^[8,12]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有影响,但是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者,认识到事件的最初信息在生成位置上的非中心性一般不成问题。然而,对其他方面的中心性则往往未注意到。认知上的蒙蔽容易导致干预策略上的选择失误,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第一,导致和产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信息不存在时间链上的中心性。它可以产生于事件的开端,也可以发生在事件的中间甚至结尾。例如,很多影响反转型网络群体性事件反转的关键信息便产生于事件爆发的中间^[20-21];而很多次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信息则往往在事件似乎要平息时突然出现^[22]。因此网络群体性事件干预者不可以囿于一般事件在时间历程上所呈现出来的“爆发”→“高潮”→“衰退”的认知图式来展开干预,从而忽视事件中后期爆发更大或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可能,导致因应对懈怠、疏忽而产生规模更大或更多的网络群体性事件。

第二,导致事件爆发或演化的人员不存在身份上的中心性。它可以是已经发表意见者,也可以是尚未发表意见者;可以是事件初始信息的发布者,也可以是事件中间的参与者和应对者。例如有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在应对时引发次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在相关的回应中,只考虑到了已经“发声者”的显性诉求,而忽视了所有人(包括未发声者)看来无须发声便应该回应的隐性诉求;或者为了安抚已发声者而采取了得罪潜在未发声者的回应方式,等等。至于在网络行为规制方面,不应只考虑到规制发帖者的行为,还应该规范干预者的应对方式和行为。

第三,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在内容中不存在中心性。它可以是初始事件的核心信息,也可以是非核心信息,还可以是事件发展过程中

新生成的相关信息,甚至是无关信息。例如在“郭美美事件”中,事件初始的关键信息是郭美美炫富,而她与红十字会可能存在的关联则是次要信息,甚至可以认为是无关信息,但是显然后来“郭美美事件”最大的影响是它对红十字会的声誉造成的影响^[23]。

第四,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责难对象具有非中心性。它可以是事件的初始责难对象,也可以是后期发展中的相关人员,甚至是无关人员和对象。以“庆安事件”为例,尽管事件中初始的责难对象为警察,但是发展至中间则涉及到了相关的副县长甚至毫无关系的安庆警方(事件参与者将庆安与安庆混淆)^[21,24]。

(二)拖延、删帖等消极干预方式应摒弃

拖延这一消极应对策略在现实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中有时能达到应对者的目的。例如,现实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可能会因工作、休息等需要或激情消退、资源耗尽等缘故而在时间迁延过久时自行散场。受此影响,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者也会采用拖延这一策略。然而这种策略不仅在理念上需要摒弃,仅就类神经网络的特性而言,客观上也难奏效,而且还可能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反而被扩大的负面结果。在类神经网络中,平行化加工意味着某一个特定加工将在同一时间被众多相似的参与者执行着。因此部分人员的退场不会影响加工是否被执行,只可能影响同时执行这一加工的人数;而与现实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在在工作时间等方面趋同这一特性不一样的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其差异性非常大,完全可能形成错峰参与的状态,从而在参与人群自由进出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参与规模不变;更何况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类神经网络的可训练、可学习与可调整性可以对新参与者产生驯化作用,还可以使得部分人员退出的同时又补充新成员代替旧有的参与者,参与规模则更会得以维持;不止如此,网络的参与是一种数字的参与,这种参与的便捷性使得参与者只需要很少的时间和资源投入便可以参与,数字的参与还意味着一次参与便等同于长期持续的参与,在网页不被移除的条件下甚至等同于永久参与。有鉴于此,应对者的拖延策略对参与者可以认为丝毫不构成影响,难以奏效,需要摒弃。

类神经网络在信息存储时的非中心性、高容损性和高持久性则提示,删帖等消极应对策略亦难以奏效。除非掌握了大量的网络管理资源,否则在信息容损性极高的条件下要通过删帖来达到消除影响的目的将很困难;即使掌握了大量的网络管理资源,要彻底消除影响也是很难的,因为只要有一个参与者保留了相关的信息(包括离线保留),再加上足够的动能,信息便可以达到全网恢复的水平。更何况,非中心性的存储特点导致删帖行为很容易被发现。一旦被发现,反而将引起网络群体性事件,激发更大的信息发布行为,因而该消极应对方式也需要摒弃。

(三)应主要干预类神经网络而非网络群体性事件

当网络具备了可训练、可学习及可调整性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智能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过程实际上都是类神经网络这个智能主体的一次训练和学习的过程,都会令类神经网络因这次训练和学习而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与改变。同时,每次网络群体性事件都是类神经网络经历以往事件训练和学习后的反应,包括尚未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也不例外。

很显然,在这种情形下,类神经网络仿佛是一个学习者,而网络群体性事件就犹如某一次学习事件。这一关系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存在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重点和最终目标显然都应该是“学习者”类神经网络,而非单次的“学习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只有通过干预类神经网络使之对网络舆情的反应趋于理性,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网络群体性事件。如果以事件为干预对象,很可能因不知网络的“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和“学习特点”而失败。即使干预成功,它也有可能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干预。类神经网络可能并不会因经历一次网络群体性事件而降低爆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更有甚者,类神经网络还有可能因一次“糟糕的学习经历”而导致“厌学”,使得未来爆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更高,干预变得更难。很多应对失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导致应对方在后续事件中变得不可信,即便发布的信息为真实信息也无法改变事件的爆发规模和概率便是例证。同时基于事件而非网络的干预,还容易导致与前文非中心性类似

的问题。另一方面,所有爆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尚未爆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都因类神经网络的连接而变得关系密切,后爆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先爆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此这也进一步意味着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以往已爆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当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亦要考虑对以后网络群体性事件干预的影响。

(四)应树立调理思想而非应对思想

前文已述,类神经网络的非中心性将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有其不可预期性;信息存储的高容损性以及可训练、可学习和可调整性都能使以往、当下乃至未来爆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依据类神经网络的这些特性,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中应该树立调理而非应对的思想。所谓调理的思想在此处是指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更高境界的干预,它谋取网络群体性事件全局性、长期性的干预效果而非谋取某个网络群体性事件或网络群体性事件某个方面的暂时干预效果。同时这种思想的另一种意涵则意味着应该对只谋取某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平息却极大损害网络群体性事件全局性、长期性干预效果者进行惩罚。

之所以要树立调理而非应对的干预思想,是因为前者可以令干预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有一个清醒、全面、深刻的认识,而后者容易导致干预者囿于具体事件而忽视事件与事件的联系,难以做到在事件的干预中全面考虑各类影响因素。调理的思想具体包括:干预类神经网络而非网络群体性事件。因为类神经网络一直都存在,不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与否为转移,进而理解连续不间断干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从而避免陷入事件爆发时疲于应付、事件未爆发时又失去目标的状态。认识到当下乃至未来爆发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都是类神经网络的输出结果,都存在密切联系,需将它们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干预方案和策略。既重视未表达观点的参与群体的特征和诉求,又重视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者自身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整体干预效果为皈依,以图改良类神经网络的反应,从而逐渐减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频率,避免以单个事件的干预效果为皈依,导致类神经网络的

反应未被改良甚至变得更糟,进而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将每次网络群体性事件既看成危机也看成将网络训练得更良好的机会窗口。从干预策略能否减少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的角度,而非从某次干预是否成功的角度来衡量它是否有效应。

以反转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为例,从应对的角度而言,通过各种手段,使得网络群体性事件出现反转便算成功。但是从调理的角度而言,还应该积极利用该次机会,让网络得到一次训练和学习的机会:网络中的信息并不一定可靠,参与前应该让真相飞一会儿。具体做法可以包括:(1)在舆情反转后进一步推动事件中的各种真相的揭示,而不是认为舆情已经反转而停止揭示;(2)通过与大V等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合作,将本次网络舆情反转与以往的反转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结合起来呈现给参与者,让网络“集中复习”一次网络中信息不一定可靠的功课;(3)在平时的网络舆情干预中,坚持不懈地揭示各类事件的真相,促进更多的反转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从而让网络获得更多良性的训练机会。

四、研究展望

根据类神经网络的特性,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干预需要以类神经网络而非具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为最终的干预对象,并且需要树立调理而非应对的思想。这在现实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原因是目前网络群体性事件干预的协同性比较弱,全国性的统一干预机构和制度也尚未成型。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干预思想似乎成为不现实的选择。即使有干预者意识到了上述需要,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做到这一点,也会由于一些其他的应对方为了平息某个具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却最终损害后续一系列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与干预,也很难落到实处,最终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因此,在未来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干预中,建立完善而统一的干预机构和制度,增加网络群体性事件干预的协同性是重要的方向。这在网络时代有其迫切性、必要性和现实性。而作为研究者,则需要尽快加强在统一干预机构与干预协同性方面的研究与探讨,比如这种机构应该是基于实体的还是直接基于网络的,协同性该以何种机制实现,等等,

从而为国家在这方面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杨立华,程诚,刘宏福. 政府回应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多案例的比较分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 [2] 郑风田,许竹青,余航. 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一个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2012(2).
- [3] 唐芳贵.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研究[M]. 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4.
- [4] 陈强,徐晓林. 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要素研究[J]. 情报杂志,2010(11).
- [5] 代华东,李霞. 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3).
- [6] 郝其宏.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对策——基于社会心理的分析视角[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
- [7] 杨明. 网络群体性事件析论[D]. 济南:山东大学,2012.
- [8] 周定财,李晗芬. 媒体融合时代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传播危机及其防范[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7(5).
- [9] 李小平. 事实推断偏向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应对[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10] 王子昀,宋陆. 网络时代提升政府回应力的对策选择——以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为例[J].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7(5).
- [11] 邓春林,何振,杨柳. 基于SIS模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传播及防控研究[J]. 情报杂志,2016(5).
- [12] 晋晓兵,杨芳芳. 网络时代的新闻把关——兼议博客、播客对“把关人”理论的冲击[J]. 传媒评论,2006(2).
- [13] 鞠躬,武胜昔. 神经生物学[M]. 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15.
- [14] Best John B. 认知心理学[M]. 黄希庭,主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 [15] 刘敏,张庆林. 推理的再认启发模式研究[J]. 心理科学,2006(6).
- [16] 艾森克,基恩. 认知心理学[M]. 高定国,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7] 百度网. 我爸是市长[EB/OL]. (2014-10-31)[2018-05-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1%E7%88%B8%E6%98%AF%E5%B8%82%E9%95%BF/4883939>.

[18] 百度网. 我妈是站长 [EB/OL]. (2015-05-22) [2018-05-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1%E5%A6%88%E6%98%AF%E7%AB%99%E9%95%BF/17635253>.

[19] 曹晚红, 卢海燕. 移动互联时代社交媒体舆情的形成与引导——以“山东疫苗事件”的微信传播为例 [J]. 东南传播, 2016(6).

[20] 陈思. 网络舆情反转现象探析——以山东“纱布门”事件为例 [J]. 东南传播, 2017(4).

[21] 梁译心. 看到了开头, 却猜不到结局——对“庆安暴力袭警”事件舆情反转的分析 [J]. 新闻传播, 2017

(20).

[22] 孟晖. 从“反转新闻”透视媒介责任——以上海女“逃饭门”为例 [J]. 传媒评论, 2016(3).

[23] 樊小玲. 机构形象传播中主体意识的缺失与重建——“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会”危机案例分析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24] 李拯. 庆安枪案, 我们该从中看到什么 [N/OL]. 人民日报, (2015-05-15) [2018-05-0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CNDTEMP&filename=RMRB201505150051&dbcode=CCND>.

The Intervention of Internet Mass Inci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rve-like Network

LI Xiaopi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human and Internet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neural network. (1) The network as a whole is distributed, trainable, learnable and adjustable. (2) The gener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is acentric. (3) The processing and transmiss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are parallel and immediate. (4) The storage of network information is acentric and of high loss resistanc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rve-like network, the occurrence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network mass incidents, and the intervention strategy are discussed. The content of mechanism level is as follows. The non-centrality of information release and the parallelism of its processing will increase th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of network mass incidents. The high durability of information storage will magnify the influence of incidents which have occurred and old information. The error adjustment mechanism will increase the outbreak scale of network mass incidents. The content of advice level is as follows. The nerve-like network rather than the network mass incidents itself should be mainly intervened, and the idea of regulation rather than the one of reply should be set up.

Key words: nerve-like network; distributed network; network mass incident; holistic network intervention

(责任编辑 合壹)